



竹林七贤和竹林七贤文化

——解读竹林七贤

本报记者 李庆森

竹林七贤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文人组合，也是一种别具特色的文化现象。1700多年来，他们寄情山水、纵酒高歌的潇洒，不拘礼法、愤世嫉俗的狂傲，回归自然、追求自由的执著，以及他们的言谈举止，都被人们推崇为“名士风流”的楷模。竹林七贤对于魏晋文化的形成，对于后来

竹林里酣饮高歌、纵论天下、谈玄论道应在情理之中。那里的刘伶醒酒台、嵇康淬剑池、孙登啸台、王烈泉等遗址，都和竹林七贤的活动有一定的关系。

竹林七贤为什么会选择焦作这块黄土地作为隐居之地呢？

这和焦作独特的地理位置有

年~262年，大约经历了15个年头。

竹林七贤的形成，经历了数年的过程。公元244年（魏齐王正始五年），时任河内郡功曹的山涛结识了寓居河内的嵇康、吕安，又将阮籍、向秀介绍给嵇康。之后，阮籍将自己的侄儿阮咸、朋友的儿子王戎介绍给嵇康。漂泊不定的刘伶加入竹林之游，则是意气相投。

竹林七贤的形成，山涛功不可没，他是竹林七贤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竹林七贤并不是严密的组织，仅仅是一个松散的文人墨客的小团体而已。

竹林七贤的说法，应该来源于他们在公元248年（正始九年）某一天的聚会。证据是，这一年的初春，高平陵之变后，王戎的父亲王浑被牵连而贬官降职，发配到怀县（今武陟）任县令。阮籍才在县政府里结识了神童王戎，并成为忘年之交。

年仅15岁的王戎参加嵇康、阮籍这些大名士的聚会毕竟是家族的荣耀。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王氏家族是竹林七贤故事的积极传播者。后来，这个故事由东晋人孙盛记入《魏氏春秋》，在历史上成为定论。

另一个证据是，此前，山涛、嵇康、阮籍都在洛阳任职。公元247年（正始八年），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权力斗争已经白热化。为了避免陷入权力之争的漩涡，他们先后逃离洛阳回到焦作避难。据史料记载，公元248年，竹林七贤都没有在任任职的记录。

公元249年（魏齐王嘉平元年）高平陵政变之后，完全攫取了曹魏大权的司马氏集团，从思想、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加快了改朝换代的步伐，6年之中，先废了齐王曹芳，后杀了高贵乡公曹髦，用灭族的酷刑把依附曹魏的大臣和名士诛杀殆尽。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里，竹林七贤寄情山水、酣饮高歌、谈玄论道的逍遥日子实在无法维持下去了。同时，竹林七贤的内部也发生了分

化，首先是山涛以亲戚的身份跑到洛阳，找司马师要了个官，投入了司马氏的怀抱。

263年（魏齐王景元三年）初，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人中卧龙”嵇康被司马昭以谋反的罪名杀害于洛阳。至此，在司马氏集团的铁腕统治下，风云一时的竹林七贤很快风流云散——阮籍、刘伶、王戎、向秀、阮咸接二连三地拜倒在司马氏的大旗之下。竹林七贤在焦作那一段颇具浪漫色彩的历史便被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

焦作造就了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逃避现实而明哲保身走到一起来了，他们出身不同，所受教育不同，年龄相差也很大，就是在政治立场、志趣爱好甚至生活习惯等方面有不少相同和相似之处。

首先，他们“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对玄学和老庄哲学情有独钟。其中，向秀对玄学有独到的研究，撰写的《庄子注》继承和发展了何晏和王弼的玄学理论，是西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嵇康和阮籍是与何晏、王弼齐名的玄学创始人，在政治上一直依附于曹魏集团。在曹魏集团大权旁落之后，以嵇康和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对司马氏集团标榜名教、诛除异己、杀害名士非常不满。然而，习惯于“坐而论道”的名士们，不敢公开反抗，于是谈玄说虚，猛烈抨击名教，并用蔑视礼法的超常规的狂放行为，表明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态度。嵇康更公开地“非汤武而薄周公”，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矛头直指司马氏集团。

其次，竹林七贤是曹魏正始年间文学界的代表。他们个个博学多才，能诗善文，其中嵇康和阮籍的文学成就较为突出。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和向秀的《思旧赋》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阮籍的《咏怀诗》，对于五言诗的发展影响深远。嵇康的《幽愤诗》等四言诗写得也不错。应该指出，上述这些流传千古的文章，绝大部分是他们在焦作作“竹林之游”时创作的。

其三，寄情山水、酣饮高歌、回归自然、追求自由是竹林七贤共同的志趣所在。竹林七贤在焦作活动之时，恰是魏晋交替之际。面对国家长期分裂、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这些恃才傲物的名士“崇简易之教，御无为

之治”的理想无法实现，又不愿趋炎附势，只好借酒消愁。

在焦作雄奇瑰丽的山水怀抱中，他们无拘无束地斥名教、捧老庄、谈天地、论人生，确实是回归自然、追求自由的理想境界。然而，司马氏残酷无情的高压政策和理想无法实现的郁闷，始终是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刘伶嗜酒如命，经常提着酒壶出游，走着喝着，还叮嘱家里人扛着铁锹跟着，说：“我死了，就地埋了拉倒！”狂放的阮咸在喝酒方面更有惊人之举，竟然与猪在一个盆子里抢酒。山涛也有八斗的酒量。阮籍更是将酒文化发挥到了极致。他一连醉了60多天，巧妙地以“醉酒”拒绝了司马昭与其联姻的要求。他还多次假装酩酊大醉，躲过了居心叵测的钟会精心设计的陷阱。



浅谈竹林七贤文化

竹林七贤的人和事，已经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永远载入史册。然而，他们寄情山水、回归自然、追求自由等超凡脱俗的言谈举止，始终被人们铭记，给人们以遐想。当然，这也是竹林七贤文化的主要内涵。

客观地说，在中国古代文坛上，竹林七贤的地位并不高。然而，他们的狂放不羁和超凡脱俗始终为世人所仰慕。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既是养生之道，更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不懈追求。

今天，我们缅怀竹林七贤，讨论竹林七贤文化，正是因为竹林七贤展示了一种自然之美、一种率性之美。浪漫潇洒，写意人生，不为世俗所羁绊，不为物欲所牵挂。竹林七贤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早已家喻户晓，更被人们羡慕不已。

竹林七贤，是我市宝贵的人文资源之一。开发这一旅游资源，对于进一步发展我市的旅游业、提升我市景区的文化品位、实现我市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知识分子的修身、处世，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几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竹林七贤又被人们尊为山水旅游的鼻祖。

竹林七贤是我市宝贵的人文资源之一。客观而全面地评价竹林七贤和竹林七贤文化，积极开发这一旅游资源，对于促进我市旅游业的发展、强化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竹林七贤

所谓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活跃在焦作这块黄土地上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七位名士的统称，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

关于竹林七贤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晋时期的孙盛撰写的《魏氏春秋》一书：“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焦作）……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南朝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撰写的《世说新语》及其他书目的相关记载，都源于《魏氏春秋》。

当年，竹林七贤寓居和活动的地区，就是如今的焦作市市区、修武、武陟一带。据记载，向秀是武陟县三阳乡西尚村人，山涛是武陟县大虹桥乡西小虹村人。据说，嵇康和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的地方，就是如今的山阳区墙南村附近。向秀和吕安共同“灌园”的菜地，也应该在这一带。嵇康在云台山风景秀丽的百家岩拥有自己的别墅。他作为曹魏王室的女婿，官拜中散大夫，收入应该最为丰厚。因此，由他做东，邀请志同道合的几个朋友到百家岩

关。曹魏政权的首都在洛阳，焦作属于王畿之地，又是经济、文化十分发达的富庶地区。加上这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瑰丽雄奇的自然山水，使当时不少达官贵人流连忘返，竞相在这儿占田置业。此外，在曹魏政权和司马氏腥风血雨的搏杀中，焦作占据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其一，焦作是司马氏的故里。其二，曹丕以魏代汉之前，魏都在邺城（今安阳）。那里是曹魏王室的大本营，一直聚居着大量的曹魏王族。焦作是洛阳——安阳交通线的必经之地，是斗争双方都密切关注的敏感地区。从焦作到洛阳和安阳的路程都是100多公里，联络也十分方便。

竹林七贤放荡不羁、纵情山水、酣饮高歌的根本原因，是不愿意陷入曹魏政权和司马氏激烈而残酷的权力之争。说白了，他们这样做只是明哲保身的韬晦之计罢了。名义上离开权力斗争的漩涡，而时时瞪大眼睛密切关注着双方的一举一动，才是他们的真实表现。选择焦作地区作为隐居之地，正是为了满足他们这种特殊需要。

关于竹林七贤在焦作寓居和活动的具体时间，可以从不多的历史资料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据推测，竹林七贤在焦作的山水之游，应该分为两个时期。嵇康于公元256年~259年到河东（今山西）学道，可以说是分水岭。前期为公元248年~256年，后期为公元259

